
长江文化带武汉段区位特征分析及城市 主题文化建设论要¹

张健，胡沫

(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23)

【摘要】以长江文化为重要源头的中华文化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武汉段长江文化是长江文化带的中部明珠，也是长江文化带的中流砥柱和重要支撑。武汉的人文历史、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区位交通等因素，孕育出长江文化带武汉段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热情奔放的文化特征。依托长江，发展长江文化，打造长江文明地标，是武汉发挥长江经济带核心引领作用、履行国家中心城市职能、带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统分联合、虚实结合、城乡融合、文水业协同，讲好“一城一水一文”的故事，助力武汉实现从国家中心城市向世界亮点城市的跨越。

【关键词】长江文化带；武汉文化段；文化区位；文化特征；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21)01-0065-10

D01: 10.16387/j.cnki.42-1867/c.2021.01.006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1][32]}文化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显示文明发展的印记。从文明的起源看，世界上的古文明无一例外地全部发源于大河沿岸。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大河文明，长江、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两条重要的母亲河，华夏文化是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为主体的二元耦合的多元文化综合体。其中，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尤其是近代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放眼未来，中华民族崛起和文化复兴必然需要长江文化的支撑。

一、长江文化带武汉段的文化区位

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法律和制度。不同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克思则在人类主体性的基础上辩证地认识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马克思通过将地理环境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统一起来，辩证地论证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深刻影响。^[2]长江沿岸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江文化。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长江文明的影响力与其经济辐射力一样，对中华文明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一) 长江文化带的文化坐标

¹收稿日期：2020-09-16

基金项目：武汉研究院开放性课题一般项目“长江文化带武汉段建设研究”(IWH20192013)

作者简介：张健，男，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胡沫，男，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长江文化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实体，其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是几千年来在与北方的黄河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长期交流融合、冲突竞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把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大势看成是“南北冲突，东西交流”。英国史学家赫·乔·韦尔斯也注意到我国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的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公元前 2000 年见于史册的中国文明乃是南北文化之间长期冲突、混合、交流的结果”。其实，自夏商时代开始，长江文化的发展就一直受到黄河文化的影响，长江文化不自觉地吸收融汇了黄河文化的部分因素；此外，它还受到东洋文化、西洋文化及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其他外来异域文化的影响。^[3]

近代考古显示，长江文明早在远古时期就很发达。季羨林先生认为，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并不是铁律，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4]1-5}。自 4000 多年前由“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进入 3000 多年前“月明星稀”的时代后，由于土壤、地理、气候的优势，黄河流域一度是华夏文明的中心。汉末开始，长江流域就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至唐安史之乱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南迁，长江流域在迎来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其文化发展也进入繁荣昌盛时期。^{[5]8-31}“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名留千古，三首《忆江南》更是形象反映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物质富庶和文化繁盛。及至宋元明清，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文化，长江流域已经超过黄河流域。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的影响更基础、更持久、更有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有力文化支撑，长江文化带应运而生。^[6]可以说，长江经济带也是文化带，文化不仅为经济永续发展加注活力，而且激活流淌于血脉中的精神力量。长江文化带的提出既是对长江经济带的一种呼应，同时也标志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从时间维度上看，长江文化带继往开来，奠定流域文明的持续繁荣。经济繁荣只能代表现在，可保证当代人的生活富足；而文化繁荣则代表未来，可跨越历史时空给予后代人精神富足。长江文化最早可上溯至元谋古猿、河姆渡、三星堆，以及夏商周时代的黄陂盘龙城、新干大洋洲，悠久历史不输于中原文化；及至春秋战国，巴蜀高度发展，荆楚文化鼎盛，吴越称霸中原；秦汉隋唐，巴蜀继续发展，赣湘文化崛起，吴越地位凸显；宋元明清，滇黔文化独特，湖湘由衰转盛，吴越文化鼎盛。在中国历史不同的发展阶段，长江文化蔚为大观，流域内各亚文化区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各个地区虽然也都曾经在物质生产上一时无双，但真正奠定其影响力的恰是其创造的文化，跨越时空，成为全人类和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物质财富。

从空间维度上看，长江文化带纵横联合，凝聚长江经济带最大同心圆。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文化带纵贯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干流串联巴蜀文化、荆楚湖湘文化、吴越文化，支流连接滇文化、黔文化、赣文化、闽文化、淮南文化，陆路联结中原文化、岭南文化、丝路文化，与黄河文化带相互冲撞、相互对抗、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共同支撑中华文明复兴大任。长江文化带的发展对增强中华文明的吸引力、感染力、认同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二）武汉文化段的文化坐标

长江文化带作为一个带状形态的文化研究对象，是由流域沿线区域的文化组成的。文化带研究既要正确反映流域文化共性，又要体现区域文化个性，通过区域个性丰富完善彰显流域共性，增强长江文化带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解释力；不仅要着眼于文化带整体研究和建设，打造长江流域带状文化生态，而且更应该以流域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和促推区域文化带的建设，以“月明星稀”的区域文化段特色来丰富和引领整个流域文化带的“满天星斗”，处理好区域文化个性与流域文化共性的关系，努力形成新热点、新平台和新品牌。在这个意义上，武汉段的长江文化就成为整个长江文化带建设中的核心部分。

一方面，武汉是长江文化带的核心城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境

内盘龙城遗址有 3500 年历史，把武汉建城史拉到夏商时期，对加强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认识和全面复原中原商代史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楚国前后延续 800 年，历经 40 余代君王，极盛时“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水陆交通、商贸网络十分发达，几乎把长江流域和南中国串联起来，外围的川渝黔、闽浙赣、岭南都在楚文化体系辐射影响之中。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武汉既是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也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武汉与长江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两江交汇的独特地理特点铸就了武汉段的中心枢纽地位和海纳百川的开放特质。武汉被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一分为三，位于中国东西通道长江中游和南北通道的中心，既是整个长江文化带的龙腰，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向来有“九省通衢”之美称。随着人流物流在武汉的周转，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贸文化、码头文化也在此汇集，以武汉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和长江上下游区域文化及南北文化的交流、竞争、影响最为密切，因此，其文化必然最能够体现长江文化特点，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点。

二、长江文化带武汉段的文化特征

关于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可以形成不同的共同体文化以及生活在共同体范围内的人们的性格和特征，“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它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过高或者太低”^{[7][12]}，因为地理环境只不过是“客观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一个过程而已，是客观精神的异化。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文化特点。长江东西跨越几千公里，贯穿起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体系，由于河流的交通属性，使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交流沟通，相互影响，呈现出流域文化的统一性。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文化在演进中也依托本地气候、地理环境、人文经济社会结构等保持了相对独立性，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方面看，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和社会经济结构特点决定了武汉段的文化特质。

（一）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历史文化

近代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已成为学界共识。无论是偏居西南一隅的巴蜀文明，还是有着蛮夷之称的荆楚文明和吴越文明都曾经称雄一方，成为中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当代，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华大地最具经济活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带状区域，无不展现出长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积薄发的品质。

楚发源于汉水之滨，楚君熊绎和他的继任者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疆拓土，扩展至楚地千里，成就了“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终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的国家。后虽为秦所灭，然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8]，推翻秦朝的陈胜、项羽和刘邦均为楚人，表现了楚人自强不息、绝地反击、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武汉作为楚文化的衣钵传承者，继承了先辈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1954 年当武汉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时，英雄的武汉人民不畏艰险、奋勇拼搏，与洪水整整搏斗了 100 天，换来了城市的化险为夷。同样的情形 1998 年再次发生时，武汉人民继续发扬武汉特有的抗洪精神，终使一江安澜。2019 年岁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千钧一发时刻，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毅然响应“封城”决策；紧要危难关头，武汉人民不畏艰险，坚守一线，在风暴之眼与病毒争高低；胶着对垒之际，武汉人民顽强不屈，不低头、不服输，最终挺过了艰难的 76 天，用壮士断腕精神成就家国天下情怀，舍小家护大家，以一城之不便换来全国之安全。^[9]

（二）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革命改革文化

晚清以来，从李鸿章、张之洞发起的洋务运动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从武昌辛亥革命到上海新文化运动开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江流域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展现了长江文化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从建党到建国，

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沿长江流域上下求索，诞生于浙江嘉兴的“红船精神”，源于重庆红岩村的“红岩精神”，生发于武汉汉阳的“红桥精神”，三者一脉相承，薪火相传。三个红色地标正好位于长江上中下游，“三红精神”传承延绵近百年，共同织就“长江红色文化带”。^[10]

在 3500 年的武汉建城史上，积淀着独特的荆楚文化特色，使这个城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改革意识。1911 年武昌古城一声枪响，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抱负，改写了这个东方大国的发展史。武昌首义留给中国的不仅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壮举，更是深植在长江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和精神感召。1927 年，在汉口一所老房子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正是这次会议，给正处于形势危急、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改变了党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时间已经证明，在许多历史的重大关头，武汉人民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充分展不了武汉人的英勇和担当。

从晚清开埠到终结帝制，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勃兴到改革开放出现的天下第一街一汉正街、武汉柴油机厂引进国内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武汉一度成为全国城市综合改革的风向标；从学分制到插班制，从辅修制到导师制，自由开放的校园氛围吸引了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名校的学生投书珞珈山，改革开放之初的武汉大学，也一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旗帜。贯穿这条历史脉络的文化红线就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为武汉发展提供了加速度，成为这座城市奋力前行的动力源泉。

（三）开放包容、吐故纳新的水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具有丰富的涵义，既是财富的象征，有八方来财的意蕴；也代表着净化去污，有吐故纳新、涤瑕荡垢的作用。武汉是一个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水域面积占比居中国大城市之首。从经济地理上看，武汉作为国之中心，地处京广南北动脉和沿江综合交通的交汇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文化交流融合和财富汇聚之地，周边的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等在此融合，人力、物资、资金等各种市场要素在此汇聚。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利用长江、汉水的水运之便，汉口发展为“四大名镇”之一；凭借长江流域的心脏位置，武汉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和对外贸易枢纽，与上海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发育最早的核心城市和长江文明的核心区域。清末的开埠，西方工业文化的因子逐渐融入长江文化，武汉开启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贸易都会转型的历程，奠定了武汉作为中国中心城市的基本格局^[11]。

近代以来武汉的发展和与水密不可分。道家认为，水处柔弱，以柔克刚；荡涤污秽，百里自净；接纳万物，包容百态。在中国近代文明发展史上，武汉一次次地发挥着引领作用，但从未居功自傲，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和兼收并蓄的胸怀气魄，迎来送往，吐故纳新，从过去走向未来，从长江走向世界。武汉从来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饱含着创造的冲动和激情；她的开放与发展的品性与生俱来，与时俱进，富有朝气和活力。

（四）奔放热情、不拘小节的都市文化

“悠长深厚的长江文化通过‘江汉交汇、三镇鼎立’的空间载体化和符号化，嵌入华夏族群的记忆之中，使得特定地理空间在文化学上建构了武汉‘大江大湖’的象征意义。这一地理因素深刻影响到武汉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支撑了武汉人的历史眼光和宏大抱负。”^[12]正是这种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势，滋养了长江流域奔放热情、空灵浪漫、自由豪放的文化性格。

作为典型的长江城市，武汉更是表现出热情大度、不拘小节的城市性格。两江分三镇的城市开局以及百湖之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武汉城市的规模之大在全国数一数二，一度媲美“大上海”被称为“大武汉”，城市的大格局也成就了武汉人的大气度。由于曾经是商贸物流交通枢纽，天南海北的人在此聚集，因此形成了独特的码头文化和带有江湖气息的武汉话，武汉人讲义气、豪爽仗义，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与武汉相比，上游的成都素以节奏慢出名，蜀人好安逸，与天府之地优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古语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巴蜀盆地环伺皆高山，拒兵马于川外，独享物华天宝，日久易消磨斗志，所

谓少不入川。在下游，上海建城虽不长，但自近代开埠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与其背靠江南富庶之地、直面太平洋的海陆交接地带，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以吴越文化、江浙文化为基底，加上西方外来文化之浸润，上海已形成风格鲜明的海派文化，其特点是中西交融、洋为中用，异域色彩明显，精致、小资也成为上海人的标志和特点。虽同处长江流域，但由于地理区位和地域文化的差异，中游的武汉与上下游的城市发展出不一样的文化性格。

三、武汉段长江主题城市文化

建设措施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武汉的城市之魂不在于城市规模之大，也不止于建城历史之久，而是源于城市融入在孕育中华文明的长江文化之韵。此韵韵在南北文化融合的开放包容，韵在一衣带水中流砥柱的转承启合，韵在“江汉交汇、三镇鼎立”的符号地标。为此，必须抓住文化之韵，讲好“一城一水一文”的武汉长江文化故事。2019年，武汉提出推动城市人口、经济实力和城市地位“三大跨越”的目标。要实现此目标，武汉不仅要立足于国家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硬核坐标，更要立足于“一带一路”交汇地带的长江文化带的软实力坐标。

（一）统分联合——长江主题文化的提炼

城市精神与地域特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把长江文化作为武汉城市主题文化，是在总结历史、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综合评价和权衡后做出的文化战略调整。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热情奔放的特征正是武汉城市精神的准确定位，既包含了楚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特征，也体现了长江文化中敢为人先的精神；既有开放包容的水文化，也有热情奔放的城市文化，是共性和个性、流域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有机统一。

1. 积极推广长江文化带概念

通过不断发掘长江文化中的共同点、共通点，强化整体意识，寻求长江文化的共识，扩大长江文化带影响力，构建长江文化共同体。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大学生音乐节、网络电影节、文艺博览会等形式，建设长江高校联盟、长江文艺联盟、长江设计联盟等流域性专业组织，争取流域的积极参与，强化长江文化整体意识。不断扩大长江文化整体的社会影响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吸引各类文化人才，多平台、多渠道创作影视爆品、文艺精品、文化巨著，争取长江文化带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2. 挖掘长江文化带武汉段的建设优势

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发展现状，抑或是国家定位和民间口碑，武汉和长江的联系是最明显的，江城名号也是最响亮的。因此，在构建长江文化带和长江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武汉要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勇挑重担，积极作为，迎难而上，发挥主导作用。在初始阶段发挥品牌优势，做好推广支持工作，推动形成流域共识；在发展阶段发挥行政、文化等优势，推动长江文化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创新升级阶段发挥人才、资源等优势，持续创作精品力作，推动长江文化带走向国门。

3. 打造长江主题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来源于城市生活，每个城市的文化都是城市的不同居民群体在不同时期创造出来的，所以，城市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具有丰富多彩的个性特点。武汉城市主题文化的确立一方面要提炼整合长江文化内涵和武汉文化资源，使二者形成合力，打造以长江为主题的城市文化，以长江之线串起文化之珠，用城市主题文化串联起多样城市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文化产品开发和表达中充分体现长江文化的共性和武汉文化的个性。使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热情奔放的文化特点

深深植入城市的每个角落，渗透到市民的性格里。

（二）虚实结合——长江主题文化的表达

文化天然带有虚化的性质，但在文化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文化以节日、礼仪、符号、图腾、口号等形式物化，便于传播，在群体中形成共识，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影响，这一过程为文化的实体化^[12]。在城市融入长江主题文化建设中，既要重视主题文化的确定，做好顶层设计，练好“虚”功；又要重视主题文化的表达，通过转移物化加以固化实化，创造“实”绩，达到虚实结合，两者兼顾。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虚与实的工作，好比人体的大脑和心脏，你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需要，哪个不需要？大脑和心脏都重要、都需要，缺一不可。所以，干工作必须虚实结合，尤其是虚功一定要实做。”^{[13]96}

1. 强化城市文化标识

城市文化标识能够丰富城市内涵，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形象，为城市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理念识别主要表现为城市精神、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充分体现了长江文化带武汉段的文化特征，准确概括了武汉的城市特质。与此同时，在城市定位、发展目标等方面凝练长江文化，把城市发展和文化带腾飞紧密结合，通过长江文化带的发展把城市推向国际舞台。行为识别主要表现在城市规章、管理制度、行为准则等方面。系统科学的城市规章制度可以有效规范城市不同主体行为，给予市民最多的生活便利和最好的居住体验，彰显城市情感温度，提高社会有效治理水平。视觉识别主要由城市的建筑风格、地理风貌、人造景观、文化雕塑、广场道路等有形的物质因素构成。不断强化“武汉—长江文明之心”的印象和标识；建设城市地标性建筑，塑造武汉特色的长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力，增添城市发展的文化含量，提高城市内在文化品质，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

2. 做好文化事业的顶层定位

从发展目标上看，武汉文化发展应以打造世界亮点城市为目标，瞄准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如音乐之都维也纳、水上之城威尼斯等。从城市文化坐标上看，武汉段长江文化在整个长江文化带建设中不是中转过往的景观文化，而是长江文化带的中流砥柱，它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的大都市、长江中游和中部地区的文化重镇、水陆纵横的交通枢纽、文水业协同的产业格局、两江四岸的生态文明、集工业遗产与江河遗产于一体的联合国教席研究基地。从文化价值上看，武汉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样本，而且也是长江经济带升级的文化样本。

3. 做好文化产业的脚踏实地

科学的顶层设计最终要落到政策实施，把文化的“虚”转化为产业的“实”。第一，扩大参与面，壮大生态圈。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各类型的文化团体、企业、从业者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拓展城市文化建设主体的多元性，树立长江文化的主体意识，从而形成长江文化发展生态圈，实现长江文化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第二，整合老资源，创作新题材。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整合现有的文化场馆，围绕长江精神，形成系统化的长江文化矩阵，构建全产业链的文化产品及服务体系，举办长江文化节、长江动漫节、长江微电影节等，鼓励长江题材的文化创作。第三，发展新形式，掀起新高潮。在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武汉段文化建设还需以世界城市文化潮流为标杆，结合新技术打造“网络+文化”“科技+文化”等文化新形式，依托网络渠道进行营销传播，进一步巩固强化武汉和长江的联系，推动新型文化发展模式，形成文化创作和消费热潮。

（三）城乡融合——长江主题文化的融入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城乡文明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城市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文明，在经济上成为区域发展中心的同时，文化上的表现也越来越强势；而乡村与之相反，通常是传统、落后的代名词，文化上也失去了乡村文化应

有的个性和特点，日益成为城市的附庸和效仿者。城乡二元结构在文化领域分别代表着现代与传统、中心和边缘、强势和弱势、主导和跟随，引发了城乡文化一系列的碰撞、冲突、失衡，这种二元文化结构宏观上表现为传统乡村文化发展式微、现代城市文化缺乏个性。相对于城市的现代文化、都市文化、潮流文化等个性张扬的显性文化，乡村文化通常扮演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具有低调朴素、求真务实的特点，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也由于其封闭、落后而在文化碰撞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解决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城乡文化融合应运而生。城乡文化融合应充分发挥城市文化的辐射带动，而不是取代和同化；推动乡村文化积极传承和主动创新，而不是跟随和效颦，使城乡文化在各自的空间范围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构建科学的城乡文化融合政策体系

第一，物质层面不断增加乡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资源差距。无论从建设数量还是服务范围上看，城区的文化服务场馆设施近年来持续完善，群众的文化需求层次和内容不断提高；但基层乡村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较严重，尤其是偏远村组的文化服务设施大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按照城市“十分钟文化服务圈”与乡村“十里文化服务圈”的文化建设标准，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14]第二，行为层面注重发掘乡村文化资源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对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情、神话传说、古建遗存、村规民约和族谱家训等，以及民间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树立保护的观念；大力扶助工匠，支持授艺、保护传统，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乡土文化能人等，借助互联网平台，积极宣传，扩大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第三，制度层面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加快城乡文化交流、互动，使城乡文化彼此消化、吸收、交融、创新，既保留传统底色，又实现创新发展；着力实现城乡文化互相认同、各具特色，使乡村出现与城市同步的新风尚、新观念、新价值，使城市能够体味和消费乡村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态资源。

2. 建立完善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第一，强化城乡基层文化主体责任。积极发掘社区作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责任主体的作用，营造良好的城乡社区环境。通过授予称号、物质奖励、划拨场地、打造品牌等形式鼓励和支持民间工匠和文化团体发展，建设社区文化发展基金支持人才培养，保证城乡社区文化人才不断层，保证城乡社区文化活动的长期开展。第二，连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互联互通。努力革新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的体制，深入贯彻实施文化资源共享、共建工程，普及公共电子阅览室，逐步实现公共文化设施数字化的基层建设。第三，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文化服务功能。在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可用较少的物质投入获取较高的文化服务产出，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组织开展有意义的法律常识、文化、学习、娱乐保健等活动，对提高乡村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是十分有利的。^[15]

3. 形成和谐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格局

第一，打造特色文化公共空间。城乡文化融合既是一个政策设计问题，也是一个空间布局问题。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指出，“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造”^{[16]582}。广场、街巷、社区、公园等公共空间是表现城市特色和城市灵魂的重要场所，通过凝练都市文化和市民风气，以雕塑、景观、建筑的形式打造具有地域特色、文化标识的公共造型。将武汉分散的各类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线索信息、历史典故传说等历史文化资源融合到现代城市空间和景观体系中。第二，形成全民文艺创造氛围。鼓励市民文艺创作，发挥民间智慧和群众主观能动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和欣赏能力，提高群众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形成阳春白雪、雅俗共赏的浓厚的文化氛围。第三，提升城乡文化记忆。武汉作为工业重镇，城市文化不缺乏工业记忆，随着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很多传统工业区呈现破败的景象，破旧的厂房成为城市发展的巨大负担。而文化在城市改造中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通过文化艺术加持转变破败厂区的存在状态，从传统工业区升级为文艺区，如北京“798”，上海8号桥和武汉天地艺术街区等。同样，城市周边的乡村基于其自然环境和建筑特点，通过文化融入和艺术改造也容易打造特色村落。

（四）文水业协同——长江主题文化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动力，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被推向市场，由市场来供给、交换、配置，文化产业成为了经济新增长点，文化日益经济化”^[6]。武汉长江文化带建设要注重打破传统思维模式，不断增强文化认知，加大资源挖掘、要素整合、产业耦合力度，在保护水生态、发掘文化内涵和产业潜力之间架起桥梁，实现文化产业由表层融合向深层融合，形成文水业协同、文化生态产业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1. 优化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体制

第一，在顶层设计基础上强化实施操作。进一步强化长江主题文化理念，树立依托长江、走向世界的目标，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围绕聚焦长江主题展开。大力塑造以长江主轴、长江文明之心、长江新城为重点的世界级城市文明品牌形象，让武汉“长江文明之心”的城市名片跨越国界，成为中国的国家标志之一。第二，在政府引导前提下强化市场主导。培育并强化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政府在税收、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真正实现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积极探索市场化文化产业资金的使用，推进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第三，在组织方式创新上重组管理权限。加强文化及相关领域事务管理的统筹联动，建立文化旅游、工商经信、教育体育、科技农业等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降低行政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充分把握文化产业跨界融合能力强的特性。

2. 推动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

实施“文化+”战略，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农业、制造业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推出新产品。利用“大江大湖大武汉”的宣传口号和“长江文明之心”的城市名片，发挥武汉历史文化优势和自然生态优势，以“两江一湖三山”的生态文化牵引，以黄鹤楼、江滩、东湖、武大等著名地标景点形成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展示、人文教育多位一体的综合文旅模式，展示武汉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形成新业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广播影视、新媒体、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文化软件服务等新兴文化产业。以形象为载体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在产品的开发中巧妙融入文化旅游形象，以此全面刺激文化消费市场，打造文化的全产业链。创新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展现新形态。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利用新平台，创新改造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文化会展和广告等传统文化产业，重塑产业形态。利用互联网平台的聚合优势，对传统文化行业进行创新改造，使受众群体呈几何量级式增长，迅速扩大影响力。^[17]

3. 培育扩大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文化建设的终端环节。首先，科学引导文化消费，引领文化消费理念。文化消费与包括水生态在内的生态文明理念具有密切的内在相关性，深入研究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培养文化消费主体，提高文化消费积极性，制定科学合理文化消费政策，营造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引导健康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开展系列文化消费活动。其次，优化文化消费模式，刺激文化消费市场。充分挖掘武汉的长江主题文化元素，以形象为载体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在产品的开发中还巧妙地融入文化旅游形象，以此全面刺激文化消费市场，打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从加强文化消费供给、培养文化消费理念、丰富文化消费业态和拓展文化消费空间等方面着手，围绕有效供给、有效消费，坚持文化消费惠民一体化。最后，打造文化产业品牌，加大文化消费宣传。突出武汉段长江文化地域优势和特色，加强独具特色的江湖地理文化、荆楚历史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宣传，使之融合到文化消费提档升级中，打好长江文化消费特色招牌。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 李学智.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谬误与正确 [N].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11-13.

-
- [3]徐吉军. 试论长江文化的发展特征 [J]. 长江文化论丛(辑刊), 2006(1).
- [4]季羨林. 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J]. 群言, 1993(6).
- [5]波音. 草与禾. 中华文明 4000 年融合史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8-11.
- [6]王耀, 涂文学.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 [N]. 人民日报, 2018-08-23.
- [7]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王造时,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
- [8]刘玉堂. 楚人精神与“支点”构建 [J]. 世纪行, 2012(5).
- [9]央视快评. 致敬英雄之城——写在武汉解封之际 [EB/OL]. (2020-04-08). <http://news.cctv.com/2020/04/08/ARTIMBJTdAATvF0pB1lW0fkQ200408.sh1ml?fron^groupmessage>.
- [10]朱惠, 刘晶晶, 黄璞. “三红精神” 织就“长江红色文化带” [N]. 湖北日报, 2019-07-05.
- [11]傅才武. 武汉“英雄城市”的文化性格 [N]. 光明日报, 2020-04-08.
- [12]涂文学, 王耀. 繁荣长江文化复兴长江文明 [J]. 学习与实践, 2018(6).
- [13]习近平. 之江新语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96.
- [14]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武汉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研究 [J]. 学习与实践, 2012(10).
- [15]朱媛媛.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整合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86.
- [16]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与场景 [M]. 倪文彦,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 [17]刘玉堂, 袁北星. 推动湖北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6).